



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

傅斯年

谈教育

傅斯年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傅斯年 谈教育

傅斯年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斯年谈教育 / 傅斯年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 1

（名家谈教育丛书）

ISBN 978-7-205-08101-0

I. ①傅… II. ①傅… III. ①傅斯年(1896~1950)
—教育思想—文集 IV. ①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0660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60mm×230mm

印 张：11.5

字 数：163千字

出版时间：2015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艾明秋 赵维宁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姿 兰

责任校对：王珂洁

书 号：ISBN 978-7-205-08101-0

定 价：23.00元

目 录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001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006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011
教育崩溃之原因	017
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	023
论学校读经	028
中学军训感言	033
闲谈历史教科书	036
漫谈办学	047
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	050
人生问题发端	055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066
《新潮》发刊旨趣书	079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083

美感与人生	091
留英纪行	101
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	105
《老子》五千言之作者及宗旨	117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节选）	126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140
史料论略	149
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	151
“五四”二十五年	159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	163
天朝 洋奴 万邦协和	167
春秋时代之矛盾性与孔子	172

导读

读这篇文章给人的最大感受是傅斯年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傅斯年少时饱读诗书，国学根底极好，入北大后深得黄侃厚爱，但不久转向，成为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的得意门生。在本文中，傅斯年明确指出中小学课程应减少至最低限度，并点名批评黄炎培等人所拟的偏重人文的高中章程。北大国学门出身的傅斯年批判人文的课程，这就不仅是他的与时俱进了。了解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应先了解这个人本身的思想志趣，傅斯年在本文中所提出的多种观点，在今天看来均有现实的意义，比如职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比如教育的独立，再比如对穷困学生的资助。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关于教育改革之具体问题，原则上我们可以有些意见。其施行的详细方案乃是教育当局的事，我们局外人既无材料在手，自然无从悬推。

教育改革具体方案之原则，一时想来有下列数事。

(一) 全国的教育，自国民教育至学术教育，要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的。这话不是江苏省教育会一系人之老调头，他们的办法是把学校弄成些不相干的职业的“艺徒学堂”。幼年人进学堂，如进工场一般，这是极其不通的。我们乃是主张学校中的训练要养成幼年人将来在社会服务的能力，养成一种心思切实，态度诚实，手脚动得来，基本知识坚固的青年。所以中小学虽有化学，然而如竟专心制起胰子来；虽有物理，然而专心做起电灯匠来，都是大可不必的。不过，化学虽不造碱，而必使中学毕业生在化学工厂中做起事来，能应用他在学校中学的化学知识；在农场中做起事来，能应用他在学校中学的动植物

知识，然后这教育不是失败的。

在这“职业训练”的要求之下，我以为中小学的课程应注意下列数事：

甲、将中小学课程之门类减少至最低限度，仅仅保留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自然知识、史地知识、体育等，而把一切不关痛痒的人文科目一律取消。一面将党义的功课坚实的改良，使其能容纳些可靠的人文知识，不专是一年又一年的叫口号。当年黄炎培等人拟高中章程，竟有了文化史和人生哲学。这个题目在欧洲尚不会建设得能够包含着基本训练之意义，试问中国有谁配教这门功课？在高中又如何教法？……

乙、每一科目宁缺勿滥。在城市的学校可减除自然知识，在乡村学校亦可酌量减除些科目，只有国文、英文、算学是绝对不可少的。每一科目既设之后，必求有实效，国文非教得文理清通、文法不错不可，英文非教得文法了然能有些实用不可，算学非教得有算术、几何、代数、最浅解析几何、最浅微分之基础知识，而能实用不可（此限度就高中言）。物理非教得对于电灯、肥皂泡、天气变化、化热力功用等等一切我们四围环境中遇到的事件，能与书本上的指示连起来不可；植物非教得能把我们园中的植物拿来分类认识出来不可。一切功课都步步跟着实验，教科书不过是一个参考的手本，训练的本身乃在动手动脚处。国文、英文也不能是例外的，历史要教到坚实而不盲目的民族主义深入心坎中，同时知道世界文化之大同主义；地理要教得知道世界各地物质的凭藉，及全国经济生活之纲领，若专记上些人名、地名、年代、故事，乃真要不得的。为实现这样的课程，教育部有设置几个专科的课程编定委员会之必要。

照这样做下去，然后以下列的标准考察一个学校办的成功与失败：一、学生的手脚是否有使用他的课本上的知识的能力；二、学生能不能将日常环境中的事与课本上的知识连贯起来。能，便是训练的有效；不能，便是制造废物了。这样的训练，不特可以充分发育一个人之用处，一个人将来在职业上的用处，并可以防止安坐享受的习惯、思想不清的涵养、做士大夫的架子。

(二) 全国的教育要有一个系统的布置。民国以来的教育，真可谓“自由发展”了，其结果是再紊乱不过的。私立学校随便开，大学随便添，高中满了全国。即令这些学堂都好，也要为社会造出无数失业的人来，而况几乎都不成样子。现在教育部有下列的几个当务之急：第一，作一个全国教育的统计，同时斟酌一下，中国到底需要些哪样人，然后制定各校各科的人数，使与需要相差不远。第二，使公立学校在上下的系统上及地方的分配上有相当的照应。第三，限制私立学校，使它不紊乱系统。第四，最要紧的——国民教育、普通教育、职工教育、学术教育，中间之相接、相配合处厘定清楚，务使各方面收互相照应之功效，而不致有七岔八错之形态。

(三) 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试以普鲁士为例，虽说大学教授讲座之选补权亦操之教育部，一切教育行政皆由部或地方官厅令行之，然其教育界实保有甚大之自治力量，行政官无法以个人好恶更动之。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革命后普鲁士教育部长免了一个国立歌剧院院长的职，竟发生了大风波。如熟悉德国教育情形，当知高等教育权皆在所谓秘密参议手中，普通教育权皆在所谓学事参议手中，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这样子固然有时生出一种不好的惰力。然而事件总不至于大紊乱。中国的教育厅长，特别是市教育局可以随便更换，这犹可说他们是政务官，然而厅长、局长竟能随便更变校长，一年数换，于是乎教员也是一年数换了。服务教育界者，朝不保夕，他们又焉得安心教书？又焉得不奔竞、不结党营私？

所以政府的责任，第一是确定教育经费之独立，中央的及地方的。第二是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审定之后，保障他们的地位。第三，教育部设置有力量的视学，教厅亦然，参以各种成绩之考核，纯然取用文明国家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之办法，定教育界服务人员之进退，及升级补缺。河南省的教育经费能独立，山东省的教育不曾换过长官，其结果便比江苏、安徽好得多，这真是值得注意的。

(四) 中国的教育是自上腐败起，不是自下腐败起。民国二十年来的事实在可以完全证实此说。教育部没有道理了，然后学制紊乱，地方教育长官不得人，校长不成样子，然后教员不成样子，然后学生的风纪不堪问了。政府有时稍稍表示认真的决心，每收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民国十五年国府在广东时，把中山大学解散了，教授重行聘任，学生须经甄别，当时的中山大学真可谓党派斗争之大集合，亦是学潮的博物馆，然而政府一经表示决心之后，竟全无问题，于是中山大学有了三年的读书生活，以后仍是政府措施不当，然后风潮又起来的。又如此次政府表示整顿中央大学的意思，不特在中大办下去了，即远在北平的大学，也望风软化。虽以刘哲一样的人，尚能以决心平服北平教育界，而况其他？……所以我的看法是：教育之整顿，学风之改善，其关键皆自上而下，都不是自下而上。若大学校长永远任用非人，虽连着解散几次又何益？然则今之政府之责任，在整顿自己责任内的事。所谓政府责任内事者，大致有下列二项：

甲、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以法兰西、普鲁士的教育部为榜样做去，不特参事、司长不能用一无所能的人，即科长、科员亦必用其专门之长。此外更设统计处，以便全国教育事项了如指掌；设教材编纂处，不再审定些亡国的教科书。

乙、厅长、大学校长、教育局长必须用得其人。其人若有人品，有见识，有资望，自然没有学潮，有也不至为大害。以我个人教书的经验论，学生多数是好学生。我一向对学生极严厉，并未遇到反响，所见的学生捣蛋，皆自教员不振作而起。

(五) 教育当局要为有才学的穷学生筹安顿。中国的家庭是世界上最腐败的，中国的家庭教育是世界上最下等的，所以严格说去，中国无“世家”之可言。惟其如此，故贤士干才多出于贫寒人家。环境之严苦锻炼出人才来，不是居养的舒服能培植德性的。科举时代，穷人是比较有出路的，一来由于当年读书本用不了许多钱，二来由于当年义学、宗塾、廪膳膏火、书院奖励、试馆等

制度，大可帮助有才无钱的人。今日之学校教育，用钱程度远在当年之上，并无一切奖金、助金。国家号称民国，政治号称民权，而贫富之不平更远甚，成个什么样子？不特就人道的立场言，极其不平；即就政治的作用论，也是种下一个最大的危险种子。所以我来提议：

- 甲、把自大学至小学的经费抽出至少百分之五来作奖学金。
- 乙、把一切无成绩的省立大学停止了，改成奖学金（国外留学金在内）。
- 丙、把一切不成样子的私立大学停止了，收他们的底款为奖学金。
- 丁、一切私立学校不设奖学金者，不得立案。
- 戊、学费一面须收得重，奖学金额一面复设得多。

于是国家有国家的奖学金，省有省的奖学金，县有县的奖学金，学校有学校的奖学金，团体有团体的奖学金。于是学生用功了，穷学生尤其用功了，学校的风气自然好，社会的秩序自然改善。

此外关于学术教育的事项，后来再论。

(1932年)

导读

民国时期是中国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并渐渐与国际接轨的时期，在此期间由于一些欧美留学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相应大量的讨论随之而来，在本文中傅斯年所谈的三个问题：与中小学教育的区别、大学的构造、教授的胜任与否都是大学的核心问题，讨论的空间很大，需要读者仔细揣摩。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本文中所谓高等教育者，大体指学术教育而言，即大学与其同列机关之教育。此中自然也含些不关学术的事，例如大学学生人品之培养等，然而根本的作用是在学术之取得，发展与应用的。

在清末行新教育制以前，中国之学术多靠个人及皇帝老爷一时的高兴，其国家与社会之高等教育机关，只有国子监及各地书院，因为府州县学还近于普通教育。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在宋朝里边颇有时有些学术，在近代则全是人的制造，不关学术了。书院好得多，其中有自由讲学的机会，有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其设置之制尤其与欧洲当年的书院相似。今牛津、圜桥各学院尚是当年此项书院之遗留，其形迹犹可见于习俗及制度中也。不过，中国的书院每每兴废太骤，“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且一切皆系于山长一人，无讲座之设置，故很难有专科之学问。且中国学问向以造成人品为目的，不分科的：清代经学及史学正在有个专门的趋势时，桐城派遂用其村学究之脑袋叫道：“义理、词章、考据缺一不可，学术既不专门，自不能发达。因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假如刘宋文帝时何承天等，及赵宋神宗时王安石等的分科办法，若竟永

远实行了，中国学术或不至如今日之简陋。

清末改革教育，凡旧制皆去之，于是书院一齐关门，而一切书院之基金及地皮多为劣绅用一花样吞没了。今日看来，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乃当时竞移书院中之科目，即旧新各式八股于学堂，而废了书院，这不能说不是当时的失策。现在我们论高等教育，这个帽子可以不管，因为今日之高等教育，除洋八股之习气以外，没有一条是绍述前世的，而是由日本以模仿西洋的。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说说欧洲近代大学的演成。欧洲的近代大学可以说有三种含素。一是中世纪学院的质素，这个质素给它这样的建置，给它不少的遗训，给它一种自成风气的习惯，给它自负。第二层是所谓开明时代的学术。这些学术中，算学、医学等多在大学中出，而哲学政治虽多不出于其中，却也每每激荡于其中。经此影响，欧洲的大学才成“学府”。第三层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大学学术化，此一风气始于德国，渐及于欧洲大陆，英国的逐渐采用是较后的。于是大学之中有若干研究所、工作室，及附隶于这些研究所、工作室的基金、奖金。当清末办新教育的时代，这一页，欧洲历史是不知道的，以为大学不过是教育之一阶段。当时的教育既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主义为主宰，对于西洋学术全无自身之兴趣，更不了解它的如何由来培养与发展。试看张之洞、张百熙的奏折，或更前一期王韬、冯桂芬的政论，都是这样子。他们本不知道西洋在发财造炮以外有根本的学术，则间接仿造西洋的学术建置，自然要不伦不类的。我们现在正也不能怪他们，以他们当时的环境做出那些事来，比其现在的教育界领袖以今之环境做出这些事来，则今之人十倍不如他们。直到民国初年，大学只是个大的学堂。民国五六年以后，北京大学侈谈新学问，眼高手低，能嘘气，不能交货，只挂了些研究所的牌子，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情景着实可笑。然而昏睡初觉，开始知道有这一条路，也或者是一个可纪的事。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也有两三种科学发达，一般对大学及学术制度之观念进步得多了，不过，今之大学仍然不是一个欧洲的大学，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即如以先觉自

负之北大论，它在今日之浑沌，犹是十多年前的老样子哩！现在似乎政府及社会都感觉着大学教育有改革之必要，我也写下几件一时感觉到的事。

第一，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二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大学也是教育青年的场所，自然不能说它不是个教育机关，不过，这里边的教育与中小学之教育意义不同。中小学之教育在知识的输进技能之养成，这个输进及养成皆自外来已成之格型而人，大学教育则是培养一人人于学术的法门中的。诚然，中小学教育需要教授法之功用，这教授法可以用来使学生自动接受训练，而大学中也不是能够忽略知识之输进技能之养成者曰不过，中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中学学生对教师是接受者（无论接受的态度是自动的或被动的），大学学生对教师是预备参与者。虽大学各科不可一概而论，工、农、医等训练之步骤要比文、理、法、商为谨严，然而大体上说去，大学各科虽不同，皆是培植学生于专科学术之空气中，而以指导者给予之工具，自试其事者也。因此情形，大学生实五年全班课程之可言，今之大学多数以年级排功课，乃将大学化为中学，不特浪费无限，且不能培植攻钻学术之风气。如大学不成为中学，下列办法适宜采用：

- 一、设讲座及讲座附属人员，以不布置中学功课之方法为大学课程。
- 二、除第一年级比较课程固定外，其余多采选习制（文、理、法、商之选习宽，工、农、医较有限定）。

- 三、每门功课不必皆有考试，但须制定一种基本检定。这种基本检定包含各若干及格证，得此项及格证之后，然后可以参与毕业考试。此项及格证在国文系者试作一例如下：

- 甲、中国语言文字学；
- 乙、中国文学史；
- 丙、中国通史；
- 丁、中国诗学（词曲在内）或词章学；
- 戊、一种西洋文学；

己、若干部书之读习。

四、毕业考试由教育部会同大学行之。论文一篇，证明其能遵教授之指导施用一种做学问之方法而已，不可不有，亦不可苛求。此外选择二三种最基本之科目考试之。

五、非满若干学期，不得参加毕业考试，但在学校中无所谓年级。

六、凡可有实习之科目，皆不可但以书本知识为限。

七、最普通的功课由最有学问与经验之教授担任，以便入门的路不错。

第二，大学之构造，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而不应请上些教员，一无附着，如散沙一般。大学中的讲课，如不辅以图书之参用，或实验之训练，乃全无意义；而在教授一方面说，如他自己一个，孤苦伶仃的，无助手，无工作室，乃全无用武之地。虽有善者，无以显其长，致其用。故大学中现在实在尚多用不着高于大学本身一级之研究院，而每一系或性质上有关连若干系必须设一研究所。大学学生本身之训练，即在其中。大学教授之日进工程，即在其中。其中若能收些大学毕业继续受训练的，自然是好事，有时也很需要。不过，研究非专是大学毕业后事，而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室之入门手续也。舍如此之组织而谈大学教育，只是空话。今之大学，各个都是职员很多，教员很多，助手很少，且有的大学教授一到校，非讲堂及休息室则无立足之地。此等组织，诚不知如何论学问。

大学本身之研究所，与大学外之研究院，也不应是没有分别的。今之研究院，有中央北平二机关，近年皆能努力，若凭理想论去，研究院与大学中之研究所应有下列之分别协调集众工作（Collective work），需要大宗设备，多人作工，多时成就，与施教之职务，在工夫及实际上冲突者，应在研究院，例如大规模之考古发掘、大组织之自然采集等。凡一种国家的职任，须作为专业，不能以有教书责任之人同时行之者，应在研究院，例如电磁测量、材料试验等。至于一切不需要大规模便可研究的工作，大学中仅可优为之，研究院不必与之重复，且有若干研究，在大学中有学生为助手更便者，在研究院反有形势之不便。如此说来，

研究院之研究，与大学中之研究，本非两截，不过因人、因事之分工而已。

第三，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今之大学，请教授全不以资格，去教授全不用理由，这真是古今万国未有之奇谈。只是所谓“留学生”，便可为教授，只是不合学生或同事或校长的私意，便可去之。学绩即非所论，大学中又焉有励学之风气？教育当局如有改革高等教育之决心，则教授问题应该求得一个精切的解决。我一时提议如下：

一、由教育部会同有成绩之学术机关组织一个大学教授学绩审查会。

二、凡一学人有一种著作，此著作能表示其对此一种学问有若干心得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

三、经上列第二项业绩之后，此学人更有一种重要著作，成为一种不可忽略之贡献者，由此会审定其有大学教授资格。

四、凡有大学教师或教授资格者，任何一大学请其为教师或教授时，受大学教员保障条例之保护，即大学当局如不能据实指明其不尽职，不能免其职。

五、既得有上列两项资格之一，而任何三年中不曾有新贡献者，失去其被保障之权利。

六、凡无上列资格，在此时情况之下，不得不试用者，试用期限不得过二年。

七、凡不遵守上列办法之大学，教育部得停其经费，或者不给予毕业证书之用印。

既澄清了大学教员界，然后学术独立、学院自由，乃至大学自治，皆可付给之。如在未澄清之先，先付此项权利于大学教授，无异委国家学术机关于学棍、学棍之手，只是一团糟，看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而混乱而已（此文写至此处，急须付印，尚有余义，且待后来再写）。

(1932年)

导读

傅斯年先生在民国时期曾有“傅大炮”的外号，他能撰文又严辞批评，将民国要员孔祥熙与宋子文轰下台。在本文中傅斯年延续了他的批判精神，直陈教育时弊，表达了对教育部门的不满；同时本文亦提出了在当时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几个星期前，我在《独立评论》上谈了几件关于教育的事。这几段文字都是发稿前一晚赶着写的，急急忙忙，都没有把话说完，而引起好些辩论和骂来。虽骂的文章多数不值得反复辩论，却也有几事有再谈一谈之必要。不幸中间小病，隔时之后，冲动既歇，好些当时要说的话忘了。现在且把不曾忘的写下几件，零零碎碎，各段自是一事，合来不成一篇文章。

一、三件关涉教育学的意见，续答邱椿先生。在本刊第九号我那篇文字中，提出三件事来。第一，大学不是适用教育学的场所；第二，教育学家必于文理各科中有一专门；第三，中小学的课程要门类少，而内容充实。现在再依次解说之。

(一) 所谓教育方法者，大致说来，当有下列几层作用：①适应学习者之心理。教者与学者年龄知识皆不同，强以自己所晓喻者加之于人是不行的。②所教科目之逻辑的、扼要的、明显的处置。小学及中学学生既是些幼年人，而教的人又非一种学问的专家，故若干人共同研究出的教育法是必要的，且只有在这样的场所中，教育法能有纲领而不失于零零碎碎，不切本题。至于在大学中，做教师者，应假定其对于所教之一科有一种专门的训练，而非为教

书之贩卖；应假定其对于所教之一科有一个会通的观点，则教出来自然应有提纲挈要的布置，如果他不是自己先不懂得的话。此外还要假定他有常识。这几个假定诚然不能实现于今之多数大学教员，然而大学教员本该如此。且大学中之学生，年龄上、知识上都用不着教员之耳提面命，除非低能到不该入学的。所有教员自己能懂得的，自然有法子使学生懂得，不待那些繁文缛节的教育方案。然则大学教员，在教书上之作用，皆在其对于自己学科之了解与造诣，而以常识、学识、讲说风度及人格，为其教育学，不学这一科，或学而无底者，焉得能为他想出教育法来？学一科，学而有底，自然能够自出教育法。即以我个人读书的经验论，在中学，在大学，在外国，所受益最多的教员，是学问最有根底的教员，绝不是注重教育法的教员。有的几位简直是老学究。诚然，学问既好，又了解教育法，固然是锦上添花的事，然而这事在大学中无关弘旨，不有正不足为害，而徒恃所谓教育法，忽略学问之自身，乃全无是处。我举一个实例，赫胥黎当年是以说话太快、思想太速为初学人所诟病的三照欧洲及英国的习惯，最好的教员教最低年级的学生，因此赫先生教普通动物学等，教得有些人怨他说话赶不上，然而赫胥黎以其学问引出多少第一流生物学家呢？若请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教育专家兼习生物者来教，能得这样效果万分之一否？一种学问精通之后。自然生出一种教育法，这话虽不可以施之于一切大学教员，然大多数是如此的。况且大学科目以其专门性质更难有普遍应用之教育法，除非常识上的事，本是人人应有的以外，至于大学中教学以外的事，尤其与教育学没有甚么关系的。大学行政在欧洲真是简单到极度，而学问自然发达，今日中国弄得愈复杂愈不相干了。总而言之，在一个大学里，如上了轨道，行政正是九牛之一毛，不是甚么高谈教育学之场所，在一学科中只要教者有学识及常识，自然能教人，能引人，不待搽粉抹胭脂的事做。

(二) 教育家必于文理各科之中先有一种专门，然后他的教育学有所寄托，不至流为不相干的空话。这话恐怕是学教育者平心静气时要承认的吧？以我所见，英、德大学之习教育都必须先习一种文理专科，然后加以教师的训